

# 群学争鸣

社会学所代表作(1980—2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编 委 会

组长 李 骏

顾问 杨 雄 王莉娟

成员 刘 漪 程福财

朱 妍 魏莉莉 束方圆

# 前 言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1月25日,是社会学自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以来,最早成立的专业研究机构之一。当时参与筹建的有李剑华、黄彩英、薛素珍等同志,均于解放前在国内外著名高校主修社会学。经历1985—1987年短暂的机构更名和2015年青少年研究所的整建制并入,社会学所在张开敏、丁水木、卢汉龙、周建明、杨雄等历任所长的领导和几代同仁的奋斗下,至今已走过40年不平凡的岁月。截至2020年1月25日,全所共有科研人员32名、行政人员3名,领导班子为李骏(所长)、程福财(副所长)、刘漪(办公室主任)。

为庆祝和纪念社会学所成立40周年,我们成立了编委会,出版《群学争鸣:社会学所代表作(1980—2020)》一书。我们请全所离退休和在职科研人员每人自主选取一篇代表作,又增补了李剑华、黄彩英、薛素珍、张开敏、段镇等几位早期创始人和所领导的代表作,汇编成这本论文集,按主题分为五个研究领域,分别是: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转型与发展、社会问题与治理、家庭与社会政策、青少年社会学。从本书的目录可以清晰地看出,社会学所40年来,不仅保持了相对集中的研究领域,而且在每个研究领域内也实现了科研人员的代际接替。通过这本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跨越时间达40年之久的论文集,读者也能一窥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在理论、方法、议题、研究上的延续与变迁。

所内许多同仁为本书的出版作出了贡献。刘漪、束方圆等收集整理了离退休同志的代表作,朱妍统稿校对了在职同志的代表作,杨雄(社会学所原所长)、王莉娟(社会学所原办公室主任)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李骏对全书内容体例作统筹安排。由于时间紧张和可行性等原因,部分离退休和曾经在本所工作但后来离职的科研人员代表作未能收录于本书,甚为遗憾。由于人手有限,全书编辑校对工作难免有疏漏失误之处,还请各位同仁和读者谅解指正。此外,郑思琪、鲁琳也对本书的编辑出版有所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2020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继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后,中华民族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社会学所恰逢此时迎来40周年,衷心祝愿她一路前行、不断奋进!

本书编委会

2020年2月

# 目 录

前言 \ 1

##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 李剑华 社会学研究的方向 \ 3
- 张开敏 记取历史教训 开展人口研究  
——回忆 20 世纪 50 年代人口学的一场论战 \ 5
- 陈 烽 社会形态的两重划分与我国当前社会变革的实质 \ 9
- 许妙发 社会学的繁荣与发展：迈向中国化之路 \ 27
- 胡建一 稳评定量分析方法的比较 \ 40
- 郑乐平 后现代视角和分析方法 \ 50
- 张结海 实验市场中的价格预期 \ 77
- 王 芳 道德认知的默会维度  
——基于认知结构的分析 \ 93
- 薛亚利 风险的民主化与科层制隐忧 \ 102
- 夏江旗 对“价值无涉”方法论的检讨  
——兼及马克斯·韦伯的学术失误 \ 113
- 刘 炜 门槛模型：一个社会学形式理论的建构与拓展 \ 123

## 社会转型与发展

- 卢汉龙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三大转变 \ 143
- 潘大渭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  
——从浪漫回归现实 \ 160

- 陶 冶 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辨析 \ 169
- 周建明 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的建构与演变 \ 180
- 田晓虹 从日本“町内会”的走向看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东亚路径 \ 187
- 陆晓文 市场经济行为规范的道德两重性与精神文明建设 \ 198
- 李 骏 非稳定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内地与香港的比较研究 \ 204
- 朱 妍 组织忠诚的社会基础：劳动关系“嵌入性”及其作用条件 \ 225
- 臧得顺 臧村“关系地权”的实践逻辑  
——一个地权研究分析框架的构建 \ 246
- 王 会 乡村社会私人休闲兴起及其后果  
——基于多省份农村的田野调研与讨论 \ 267

## 社会问题与治理

- 吴锦芳 中年知识分子业余生活的调查 \ 279
- 丁水木 维护社会稳定的两个理论问题 \ 282
- 夏国美 社会性别、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 \ 288
- 刘文敏 上海村级经济发展趋势与对策建议 \ 302
- 刘正强 中国访民的理想型  
——立基于韦伯社会行动理论的本土解释 \ 307
- 张虎祥 中国社会治理的转型及其逻辑 \ 322
- 陶希东 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战略选择 \ 336
- 康 岚 个体化赋权：特大城市中新“土—客”关系的调适路径 \ 347
- 朱志燕 民族形象建构与双重弱势：城市中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  
——对“切糕事件”的社会学分析 \ 357
- 张友庭 污名化情境及其应对策略  
——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及其社区变迁的个案研究 \ 367
- 苑莉莉 贫困治理创新中的慈善信托研究  
——基于网络化治理的视角 \ 383

## 家庭与社会政策

- 黄彩英 城市家庭的养老功能及其变化 \ 401

- 薛素珍 离婚问题今析 \ 409
- 吴书松 老年残疾人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 415
- 徐安琪 离婚风险的影响机制  
——中国的综合解释模型探讨 \ 425
- 孙克勤 转型期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 439
- 汤 潇 市场背景下我国福利企业发展分析  
——以上海市为例 \ 449
- 徐浙宁 我国关于儿童早期发展的家庭政策(1980—2008)  
——从“家庭支持”到“支持家庭”? \ 458
- 程福财 中国流浪儿童福利政策的绩效:基于流浪儿童视角的分析 \ 474
- 张 亮 “丁克”家庭:青年人的时尚?  
——一项国际比较研究 \ 486
- 刘汶蓉 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  
——基于对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 \ 497
- 魏莉莉 提升国家竞争潜力亟需变革家庭教养方式  
——基于上海市“90后”青少年成就动机的实证研究 \ 515
- 何 芳 美国家庭支持服务育儿模式之审视 \ 528

## 青少年社会学

- 段 镇 论中国儿童组织的社会功能  
——为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40周年而作 \ 539
- 金志堃 青年研究在亚洲 \ 545
- 倪新明 儿童劳动教育与全面发展  
——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 \ 548
- 姚佩宽 论青春期性教育的适合性原理 \ 556
- 陈建强 段镇少先队教育思想评述 \ 563
- 苏颂兴 当今世界青年研究的若干趋势 \ 571
- 孙抱弘 后发型现代化进程与民族性发展  
——新时代国民素质与青少年教育建构性演进之路的探讨 \ 580
- 董小苹 1992—2012:中国青少年的社会参与 \ 594
- 杨 雄 青少年性行为“滞后释放”现象的实证解释 \ 610

- 曾燕波 社区青年就业促进机制研究  
——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青年的生存与发展 \ 626
- 裘晓兰 日本“无欲世代”的群体画像和成因探析 \ 638
- 雷开春 青年网络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路径分析 \ 648
- 华 桦 社会转型时期的青年未来观研究  
——以对上海部分“80”“90”后的调查为例 \ 662
- 刘 程 城市青年的社会信心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 677
- 梁海祥 居住方式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 690
- 徐一叶 针对自闭症谱系障碍患儿的音乐治疗干预 \ 706

#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 社会学研究的方向

李剑华

自从法国孔德创立社会学这门学科以来,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比较起来,由于其生也晚,在社会学研究的范围上,引起其他社会科学的非难。当社会学要谈到犯罪问题的时候,就被认为侵犯了法律学的领域,当社会学不能不谈到经济问题的时候,就被认为侵犯了经济学的领域,当社会学要谈到教育问题的时候,就被认为侵犯了教育学的领域,如此等等。社会学为了要在社会科学的广阔天地中争得生存的权利,每走一步,都要经过不平凡的战斗。

社会学在我国的遭遇更是不幸。有些人认为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完全代替社会学,甚至有些人认为社会学是专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于是,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各大学的社会学课程被取消了,各大学社会学系被取消了,社会学刊物被停止出版了,社会学从此被打入了冷宫。这是不公正的。

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现象。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科,因而社会学不能不与政治经济学、法律学、教育学、伦理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等处于平等的地位,并有着密切关系。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中社会关系的科学。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如劳动关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民族关系、邻居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等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中发生的问题,如劳动问题、就业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犯罪问题、人口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贫穷问题、住宅问题、青少年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安定团结问题、社会道德问题等,都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范围。

社会学研究的范围既然如此广泛,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只能选择当前比较普遍、比较突出的问题,集中主要力量打歼灭战,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加以研究。

在社会现象中,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一切事情都有其个别情况。我们不能按照主观意志,随便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去进行调查研究,至于根据个别事实就随便作出结论,那是更错误的。如上所述,我们要选择当前比较普遍、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例如当前较普遍和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大中城市中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为此,社会学工作者就应该根据青少年的年龄、性别、犯罪时间、地点、文化教育程度、家庭情况、就业情况、经济情况、思想情况、社会影响、犯罪情况(包括是个人犯罪还是集体犯罪、是屡犯还是偶犯)等方面来进行调查研究。

从社会现象中研究青少年的犯罪问题,可以看出社会学与法律学的关系及其不同分工。犯罪事实发生以前,如何预防犯罪,是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发生以后,如何依法论处、如何量刑、如何劳动教养、如何防止犯罪的再发生、如何把犯罪者改造成新人,成为社会上一个有用的人,那就是法律学研究的范围了。当然,社会学家所研究的问题,法律学家也要研究的。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教学科研秩序的正常进行,为了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四化的顺利实现,这就要求社会学与法律学的紧密团结合作。因为社会现象是一个整体,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各部门的分工,不是“划疆而治”“老死不相往来”的。

(原文载于《社会》1981年第1期)

# 记取历史教训 开展人口研究

——回忆 20 世纪 50 年代人口学的一场论战

张开敏

我国历代对人口问题都非常重视,出现了不少卓越的人口理论家,留下了丰富的人口思想遗产,供后人研究借鉴。1949 年之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我国人口已经开始迅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一般都在 2% 以上,个别地区甚至接近 4%。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及时地对人口问题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论点和建议。然而,不幸的是,这些论点和建议非但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并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却反而横遭压制和摧残,以致人口问题从此成为禁区,学术界对之望而却步,噤若寒蝉,人口理论几成绝响。其后果如何,有目共睹,无须赘言。

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地春回,万象更新,学术界恢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人口问题高度重视,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已经成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性任务。在新的形势下,人口理论的研究亟须加快步伐,为制定和贯彻正确的人口政策提供科学的论据,为切实执行计划生育,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然而,抚今追昔,感慨无穷;继往开来,激励良多。重温 20 世纪 50 年代人口理论的一场论战,对促进当前人口理论的研究工作不无裨益。

50 年代从事人口问题研究的大多为老一辈的学者专家,他们曾经受到历史上各种人口思想的影响,其观点或有不尽符合马列主义之处,其立论亦有可以商榷之余地,但他们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一片丹心,不容泯没,他们直言无畏的凛凛风骨,尤足令人敬佩。

当时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 50 年代后期,在论点上主要围绕着控制人口增长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而进行。主要著作有王亚南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人口问题》、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吴景超的《中国人口问题新论》、陈长衡的《谈谈过渡时期的中国人口问题》,以及其他作者的诸多有关论文。其内容,要言之,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 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积累资金问题

《新人口论》和《中国人口问题新论》都较多地论述了这一问题。马寅初老先生持论尤为恳

切,他首先提出:“除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外,我认为人口多,资金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矛盾。”

又说:“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

“因人口多,所以消费大,积累小,而这点积累又要分摊在许多部门中,觉得更小了。”

马老在分析人口与消费、积累的关系时,出于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大声疾呼:

“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

吴景超先生在《中国人口问题新论》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论点,他说:“中国的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不平衡的。我们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可以把目前存在的劳动,加以最合理、最经济、最有效的利用。”

因而他认为:“过高的人口出生率,是有碍于积累的迅速增加的。”

吴先生还说:“我们提倡节育,除了一般人所说的为了妇婴的健康、子女的教育、民族的繁荣等理由外,还是为了要迅速地提高人民的劳动生产率,要使我们的生产合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因而使我们现在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将来能不过分费力地解决基本经济任务。”

老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向往热爱之情,跃然纸上,感人至深。

## 二、关于劳动就业问题

1949年以前,中国留下了严重的失业问题,经人民政府大力安排,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到了1956年、1957年,失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然而人口的激增隐伏着若干年后就业安排的困难。这一问题,在当时的人口学讨论中已预先敲起了警钟,如钟惠澜先生即提出:

“若对人口生殖不加限制的话,今后每年将出现1000多万无事可做的人。”

孙本文先生也指出:

“如果全国总人口照目前的增加率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除了农业部门外,至少尚有400万—500万人要就业。可见,照这个人口增长速度,以后职工就要发生问题的。”

王亚南先生发人深思地提问:

“人的劳动在任何社会阶段,都是极宝贵的财产,或财富的源泉,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制度,能在何种程度允许对它的现有劳动力作合理的利用与安排。”

马寅初先生则提得更为直率与具体,他说:“今年增加的1300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100万人,其余1200万要在农村工作。”

马老更进一步联系到实现现代化之后的就业问题,提出了在当时即值得加以深思的问题。他语重心长地问道:

“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随之扩大,从前1000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50个人就可以做了,请问其余950人怎么办?”因而,马老的结论就是:“我就考虑到

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自动化……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

早在 50 年代即提出这一问题,能不说是科学预见和老谋深算吗?

### 三、关于改善人民生活问题

把人口与生活资料相联系,特别是与粮食生产相联系,在当时确属冒险之举,然而这一禁忌却仍未能阻挡科学家们对真理的探讨。孙本文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中说:

“粮食增产是有限度的,因为耕地面积是有限度的。所以如果以后人口继续增长,总数达到 9 亿、10 亿,那么粮食供应分配情况就不是这样乐观了。”

马寅初先生也提出,“就粮食而论,也非控制人口不可。”并且举出 1953 年每人平均耕地为 2 亩 8 分,1955 年已降至 2 亩 7 分的实例,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此外,马老还进一步联系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说明人口增长与农、轻、重之间的关系。他说:

“各种经济作物与粮食争土地,二者之间一定要求得一个适当的平衡。若人口无限增殖,这一适当平衡将更被破坏,因人口增殖,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到轻工业,间接影响到重工业。”

10 多年来,农、轻、重比例关系的失调固然有着多种原因,但是人口的激增使得矛盾分外突出的事实,也是不可否认的。

钟惠澜先生以医学名家,对人口问题亦有卓见,他说:“对人口生育如不加限制,则人民生活某些程度上不但不能提高,很可能反而要比现在降低。”

“如果在 15 年内,我们将人口控制在 7 亿以内,积极地完成祖国经济建设计划,那么 1972 年的时候,全国人民可以得到丰衣足食的美满生活。”

遗憾的是,这样的合理化建议未能付之实现,而上述孙本文先生关于人口增加到 9 亿、10 亿时的困难,却不幸而言中。

王亚南先生在批判马尔萨斯的同时,也从理论上指出:“我们原不否认,一个社会,特别是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社会的现有生活资料,即使公平合理地被分配于全体居民间,仍可能有供不应求,仍可能有人口压迫生活资料的现象发生上述论点的现实意义,在今天更为明显了。”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使粮食生产和其他农副产品生产的发展同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发展比较适应。”正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 四、关于文化教育、科学研究问题

10 多年来,我国的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惨遭“四人帮”破坏,损失严重,对国民经济造成

极大危害。当前要尽快地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深感人口过多,消费过大的负累。然而,早在20多年前,马寅初先生对这一问题即已作了评论。他极力主张提高人口质量以适应科学文化的发展,老先生不避风险,力排众议,毅然指出:“我们已进入原子能时代,科学的发明层出不穷,要利用这些新发明,利用者就非有相当的知识和技术不可。这些人不在乎多,而在乎精。”

又说:“我们必须首先推进产业部门的技术装备,从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后才能奠定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现在我们科学工作的条件虽然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受现有工业水平和国家财力的限制,还不能完全满足开展研究的要求。欲达到这个目的,唯有加速积累资金,一面努力控制人口,不让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学研究前进的后腿。”

为此,他坚持认为:

“我国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两不相称,几乎无人不知。”

“唯有在人口问题上,我们要赶的是‘质’,不是‘量’,因为就量而论,我们早已赶上了。”

“要提高质量就非控制数量不可。”

马老关于“提高人口质量”的建议,在当时备受围攻。然而,实践证明,我们今天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痛感人口虽多而人才缺少的事实,岂非一向轻视人口质量的确证。

综观上述诸论点,中肯贴切,析理精微,所论控制人口增长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之重要意义,至为明显,无可置疑。若能及早采纳力行,今日将受益匪浅。但是,令人难以索解的是,顷刻之间,形势急转,研究竟成追究,讨论变为讨伐,直至60年代初,犹有未绝。

所幸1963年以后,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自关怀下,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筚路蓝缕,历尽艰辛,总算有所开展。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任劳任怨,奋斗不懈,坚持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今天以及今后计划生育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恩来生前遗愿“要求在21世纪以内把人口净增率控制在1%”<sup>①</sup>,即将提前实现;周恩来生前遗言“社会主义制度对人口没有计划这也算是个短处,马克思、列宁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我们要来研究”,<sup>②</sup>今日思之,倍感迫切。人口理论之落后,由来已久;计划生育之宏图,方兴未艾。著书立说,申明利害,振聋聩发,明辨是非,为计划生育,开一代之新风,已成当务之急,势在刻不容缓。切盼学术理论界同志,努力趁良时,关键在今朝!

(原文载于《学术月刊》1979年第9期)

① 《在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9月。

② 《在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1968年2月。

# 社会形态的两重划分与我国 当前社会变革的实质

陈 烽

##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与开放的深入、全面发展,在我国已经出现一股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潮流。从总体上把握这场社会变革,在理论上给予明晰的说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但是,我国原有的社会发展基本理论体系却无力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在它的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中,在它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基本适应、只需完善的论断中,无法找到我国当前进行如此重大社会变革的必要性,更无法得出人们日益感受到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第二次革命”的判断。因为革命意味着质变,而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场变革中并不发生质变。在这种理论体系下,人们往往直接引用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一般原理,对当前特定的社会实践加以论证。令人尴尬的是,这种理论体系对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普遍规律”的概括,一方面无法得到除西欧之外的世界绝大部分地区普遍史实的支持,另一方面却始终成为中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应当补资本主义的课”等主张的依据。

近几年来,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发展的一些理论、学说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他们的“农业社会(文明)”到“工业社会(文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等概念和论述,已被日益广泛地用来说明我国当前的社会变革,人们感到这种历史分期法有其可取之处,他们对两大历史时期社会特征的许多描绘和概括,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历史的普遍事实。而这些内容正是我国原有社会发展理论中所缺乏的。但是,从我国原有社会发展理论看来,这种方法和理论的明显问题是“技术决定论”和“超阶级性”,“工业化”和“现代化”只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联系的概念,不能用来说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因而不能构成社会形态的概念。把工业化、现代化扩大为社会整体的状态,不仅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而且意味着我国不仅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而且在整个社会的发展阶段上都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观和基本原则是不相容的。

挑战是严峻的。唯一的出路是重新理解和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基本理论。所

谓重新理解,就是彻底审视我国原有的社会发展基本理论体系是否真正符合和完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也就是“回到马克思”;所谓继续发展,就是严格按照当今世界和我国社会发展的事实,对经典作家的有关理论进行检验、修正、补充和发展,也就是“超越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吸收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是完全必要的。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长期受到忽视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三大形态的理论,为我们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点。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sup>①</sup>马克思在这里划分三大社会形态的方法显然不同于他划分五种社会形态的方法,而对前两大社会形态的划分则接近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划分。本文试图对马克思的划分社会形态的两种方法和理论,及其对认识我国当前的社会变革的意义,作一概要的探讨。

## 二、生产关系的两重结构

人类社会是由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综合体系,生产关系是其中最基本的关系。以生产关系的不同类型作为区分人类社会不同形态的根本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它实际上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一个由多种关系组成的体系。按照笔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理解,生产关系至少可以分解为两个基本方面或层次,劳动占有关系和劳动交换关系。这两者构成了生产关系的两重结构。要想取得对生产关系完整、科学的认识,必须对这两重结构分别进行考察,然后综合起来加以认识。

### (一) 劳动占有关系及其历史类型

劳动占有关系所表明的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是否和怎样实现对自己或他人劳动的占有。它包括人们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关系和对劳动要素的占有关系。

劳动占有关系的最终体现是人们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关系。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物化,对劳动的占有最终表现为对劳动产品的占有。恩格斯曾经使用“产品占有方式”的概念来论述个体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区别,指出前者是“占有我自己的产品”,后者是“占有别人的产品”。<sup>②</sup> 劳动产品的占有关系也就是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不同的产品分配方式形成不同的产品

<sup>①</sup>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sup>②</sup>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0页。